

走向犹太国

——赫茨尔与乌干达计划评析

陈 曦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犹太复国主义自发展之日起就将建立犹太人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明确的奋斗目标, 于是复国地址的选定问题, 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重要的选择。赫茨尔作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在此问题上, 他的思想与行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乌干达计划是选择复国地址的过程中影响最重大的尝试, 它虽然失败了, 却导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惟一的建国之地这一目标最终得以确立。本文试图描述整个计划的全貌, 探讨乌干达计划失败的原因, 并分析乌干达计划在赫茨尔一生中的地位问题。

关键词: 赫茨尔; 乌干达计划; 犹太复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K3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5636 (2007) 03 - 0054 - 05

乌干达计划是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向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赫茨尔提出的向东非的乌干达移民的计划, 他提出, 他将提供乌干达给赫茨尔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这个计划几经周折最终流产了, 这一事件后不久赫茨尔就去世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犹太复国主义史中, 将它作为其中一个叙述性的事件, 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没有清晰的论述, 因此,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本文试图在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揭示赫茨尔实现复国理想的思路与实践方向, 并指出乌干达计划给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该计划也在赫茨尔的一生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 乌干达计划也透视出大国势力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

一、先于乌干达计划的不同选址主张

早在十八世纪世界各地就响起了号召犹太人回归故地的呼声, 其中对于犹太人究竟应该在哪里建立他们的民族国家, 却没有统一的声音。1797 年查理·德·利涅王子在一份私人备忘录中建议在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之后一个美籍犹太法官、作家和前外交官曼纽尔·诺亚又建议在靠近布法罗的大岛上成立一个象征性的犹太国。作为英国外交部喉舌的伦敦《环球》杂志在 1840 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不仅主张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而且阐述了此举的可行性, 认为犹太国将在土耳其人和埃及人之间构成一个缓冲地带, 并且将增强英国在地中海东部诸国和

岛屿间的影响。^[1](p.53)]同时在德国出版的“重建独立的犹太国草案”却拒绝将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建立犹太国的理想之地, 比较有代表性的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列奥·平斯克对于巴勒斯坦作为建国之地的态度也极不明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于东欧的热爱圣山运动对巴勒斯坦的执着以及目标的明确, 对于整个犹太人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可见,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壮大, 建国地址的选定就成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环节, 它不仅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复杂多变的特点, 同时在国际关系当中也成为一敏感而牵涉面较广的问题。1903 年提出的乌干达计划使犹太国的选址问题又一次成为犹太世界关注的焦点, 并且引发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的严重分歧, 赫茨尔起初对乌干达计划的接受险些导致了运动的分裂, 因此很多人将这一事件称为“乌干达危机”。这一次对于选定建国地址的尝试是赫茨尔对犹太人问题认识的又一次深化——巴勒斯坦是建立犹太国的惟一选择。

二、乌干达计划提出前的选址尝试

从赫茨尔倡导并主持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颁布的《巴塞尔宣言》来看, 他对整个运动的领导有明确的思路, 即积极采取外交手段, 争取大国的支持, 获取“特许证”, 进行合法的大规模的移民, 并致力于将解决犹太人问题放到国际环境中解决。有人认为赫茨尔在

此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思想的前后矛盾，并且常常混乱不清。”^{[1](p.169)}然而，任何开创性的事业必定在摸索中前进，乌干达计划就是赫茨尔复国事业中一次重大的摸索和尝试，同时，这个尝试也是在多次试验的失败后应运而生的。

在乌干达计划提出之前的数年里，赫茨尔为建立犹太人国家寻找土地实践了很多方案。最初，赫茨尔一直奔走于土耳其苏丹与各级官员之间，希望土耳其能把巴勒斯坦还给犹太人，作为交换条件，他提出犹太人不仅会支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还可以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帮助土耳其偿还债务，摆脱欧洲大国对其财政的控制。可是，土耳其政府对赫茨尔的承诺充满了疑虑，除了不断地提出非分的要求，并没有准备采取明确行动的迹象。赫茨尔只有转向寻求其它力量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达到最终的目的。赫茨尔首先将努力的方向转到了德皇和罗马教皇身上，可是，德国官方却在公报中直率地声明：尊重苏丹所作的一切符合土耳其利益的事，而罗马天主教主表示了对于犹太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1902年，在上述外交活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赫茨尔将活动的重心转到了伦敦。1902年10月23日，赫茨尔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起初的磋商中提出了两个计划，即塞浦路斯、阿里什——西奈半岛。^{[2](pp.1360-1361)}张伯伦起初认为他只能谈及塞浦路斯计划，但是他认为不能因为新移民而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希腊人和穆斯林赶走，这个计划因为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反对而变得很困难。张伯伦建议赫茨尔通过外交部的兰斯登勋爵与英国驻埃及的大使克罗默勋爵商谈其它两个计划。与兰斯登的会晤因为没有被拒绝，赫茨尔情绪显得很乐观。此后，赫茨尔通过与克罗默的多次商谈，使他一度对阿里什——西奈计划充满了信心，在1902年10月24日给赞格威尔的信里，他甚至已经在为阿里什犹太人定居点做规划：“需要建立一家殖民公司，即犹太人东方公司，以五百万为资金。移民可以通过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组织起来……必须选派一批以科学知识和经验武装起来的先锋前往，英国将给予犹太人最有力的保护等等。”^{[3](p.1366)}此后，赫茨尔一直派遣他的助手格林伯格前往埃及与克罗默会谈阿里什计划，直到11月底格林伯格都称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这使赫茨尔对于梦想实现的期望空前地膨胀起来，他认为只要获得埃及政府给的所有权和英国政府给的尽可能多的势力支持后就有足够的把握去和土耳其为获得特许证的权利进行谈判了。所以，在张伯伦于1903年4月首次向赫茨尔提出了他去非洲巡视期间为犹太人找到的一片适合移民的土地时，赫茨尔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张伯伦认为“乌干达海滨地区气候炎热，但内地的气候对欧洲人来说极为适宜。那里可以种植甘蔗和棉花”，是“可供赫茨尔博士使用的土地。”赫茨尔立即回答：“我们的基础必须建在巴勒斯坦或者邻近地区，以后我们或许也会在乌干达定居，因为我们有大批的人等着移民。但是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民族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阿里什计划在政治上对我们有如此之

大的吸引力的原因”，虽然将巴勒斯坦“作为投资对象是一笔坏买卖。没有人会为这样一个国家付钱，除了我们，因为我们有潜在的政治动机。”^{[4](p.1473)}赫茨尔认为阿里什计划离犹太人复国梦想的实现更近一些。

但是，阿里什计划最终失败了。埃及政府拒绝了阿里什计划，因为他们的水利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这项计划成功，其所需的水量应为原来所估计的5倍。从尼罗河引出这么多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4天之后，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他本来认为阿里什-西奈计划是十分有把握的，所以他不打算买下暂时埋葬他父亲的多布林公墓的墓穴。“现在，我认为事情是彻底完了，所以我去了城市法院，买下了28号墓地。”^{[5](p.1491)}

在阿里什计划失败一个月后，经过与格林伯格和张伯伦的进一步会谈，在1903年6月7日的信中，格林伯格对赫茨尔提出劝诫：“对我来说东非向来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它将因为没有道德和历史的号召力而无法对我们的人民形成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得充分，张伯伦这个计划的价值在政治上是极大的。我认为这件事的精华所在是我们所获得的英国政府的支持将成为他愿意支持我们人民的明确宣言……这对于你，对于我们运动的内外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关键的不是是否后来我们拒绝了东非计划，而是我们应该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认同，这个认同是不能背弃的，也是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后能够推翻的。这一点做到后其它的每一件事就可以开始了，这一点就是认同我们为一个国家。此后很自然……如果它发现东非不好，他们将不得不做一个更长远的计划，这就会逐渐且绝对地将我们带回到巴勒斯坦去。”^{[6](p.43)}同时，通过赴波兰考察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后，赫茨尔开始倾向于考虑东非计划。

三、乌干达计划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

乌干达计划在1903年8月23-28日于巴塞尔举行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提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一场暴风雪，差点导致了运动的支离破碎。这个计划的反对者们认为赫茨尔已转而以东非取代了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定居点。阿哈德·哈姆是具有代表性的赫茨尔的批评家，他担心对锡安的向往将会交付给历史并永远只留在祈祷书中。^{[7](p.44)}魏兹曼在他的自传《尝试与错误》中，作为阿哈德·哈姆的信徒指责乌干达计划是一个将犹太复国主义带到十字路口的“空想”计划。^{[8](pp.89-90)}赫茨尔经历了诸多的失败特别是阿里什计划的破产，带着病痛的折磨，想着大多数东欧犹太人的处境以及英国在犹太人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没有一刻不处于矛盾斗争当中。

赫茨尔对乌干达计划有着深层的考虑。起初赫茨尔亲密的战友马克思·诺尔道，主张东非那个区域不适合殖民，犹太难民应该移民去条件更好的美国和欧洲。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会丧失它的种族特性，而导致这个民族的终结。^{[9](p.43)}赫茨尔对诺尔道的劝说，反映了他在东非计划上的立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感激地认识到张伯伦的帮助，其中包含了他的同情并促使他为犹太人做一些事情，

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寻求实际解决办法时，难道应该使东非作为适合的定居点的资格丧失掉吗？赫茨尔阐明与英国政府的谈判是战术上的需要，他们能使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实现早于所有的罗思柴尔德男爵的殖民地而到来。摩西回到迦南也是走的迂回路线。不顾一切要到达的目的是从英国那里得到一个特许证和对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认同。‘我们去锡安的路上要有特许证铺路……这将增加我们与土耳其较量时的砝码。”东非只是为返回巴勒斯坦的外交手腕之一。^{[3](p.44)}诺尔道因而转为支持赫茨尔的想法。

与会代表对乌干达计划的态度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在 1903 年 8 月 14 日的第六届犹太人复国主义大会上，当赫茨尔将克莱门特·希尔先生关于乌干达计划的来信拿到大会上征求赞成票时，与会者们的反应是支持的，甚至是热情洋溢的。当一个怀疑论者指出在英国的来信中没有提及巴勒斯坦，赫茨尔回复说它是用“隐形墨水”书写的，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它将会变得更加清晰。^{[9](pp.161-162)}尽管出现了一些临时的混乱，会议最终同意将希尔的信拿到大会中讨论。1903 年 8 月 23 日，赫茨尔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我们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去。”东非计划是根本不能使我们以此取代巴勒斯坦的。“乌干达不是锡安也永远不会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给我们的人民移居到那里的指示。”^{[13](p.44)}但是赫茨尔仍认为英国的帮助将会是有用的，并号召大会能很感激地接受这个计划。赫茨尔也详述了苏联内务大臣普列为给他的信。他将这封信视为外交上的特别成就，在为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斗争中，这封信有着无法计算的价值。^{[9](p.267-309)}这封信在乌干达计划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的强烈阻力时，使赫茨尔能够考虑乌干达计划是不是还要继续实行下去。他明白俄国人和英国人对运动的支持有着各自的动机，英国人可以因为他们的好心得到犹太人在资金上的酬谢，还可以在其它国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用这样崭新的交流方式将现有的殖民地扩展开去了。俄国则企图从内部削弱土耳其人，并在瓦解土耳其的战争结束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24](p.1367)}可是英国的文件虽然措辞谨慎，却承认犹太人为一个民族，有资格建立一个国家，而俄国没有。只有国家才有权要求领土，而且，只有一股力量的支撑是不充足的；只有在各大国势力的一致压力下才能影响土耳其人。这样的联合在 1912-1913 年的伦敦会议上确实出现过，随后就是巴尔干战争。但是，到那时候赫茨尔已经辞世了。同时，赫茨尔的基本主张是犹太人这个国际性的问题应该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解决，并不是只依靠单一的力量，即使有了俄国的支持也不能舍弃英国。

会议此后的发展将运动内部的危机深化了。当各个派别和核心小组退出会场详细考虑这个计划时，仅仅为讨论是否向乌干达派遣一个调查团时，就出现了很多反对意见。施马尔雅胡·莱温，最初是一个炽热的支持者，听到诺尔道将乌干达比作“夜间庇护所”后，他怀疑“夜间庇护所”将变成一个永久的庇护所从而损害了返回锡安的理想。然而，即使有如柴可里诺夫等俄国犹太人团体的领导人的反对，赫茨尔的巨大声望还是促使大会的 611 名代表

中，292 名赞成派遣调查团到东非去，176 名反对，143 名弃权。当结果公布时，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的俄国成员的带领下负气离开了会场，他们普遍的感受是大会的决定违背了《巴塞尔宣言》精神，也宣告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终结。梅纳赫姆·乌西施金，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执委会的成员，在第六次大会期间，乌西施金呆在巴勒斯坦。在他的归途中，没有事先与赫茨尔商量，他就告知所有执委会的成员，他是不会遵守大会决定的，并要将他的意见公开。赫茨尔驳斥乌西施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为执委会服务的同时又攻击它。赫茨尔提出他与伦敦的商议无非是为他与君士坦丁堡的较量增加手力，他也要乌西施金解释什么是他的和平“渗透”计划——一个缺乏合法基础却想将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实现带得更近的计划。赫茨尔认为“渗透”的道路是冒险的和诚实的，而且它肯定是不能推动赫茨尔所预想的那样大规模的移民的。但是乌西施金丝毫不掩饰他想继承赫茨尔职位的野心，并在 1903 年 1 月 11-14 日在哈尔科夫（苏联城市）召集具有相似意向的人聚会。赫茨尔认为这一举动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团结的一个威胁。他在 12 月 4 日的日记中提出：（执委会）的俄国代表，特别是乌西施金、雅各布森等人已经公开叛变了。他们想要给我最后的期限：我必须放弃去东非的想法。这些现象的出现使赫茨尔只能最终放弃“乌干达计划”并全力投入以巴勒斯坦作为替换这个计划的实际工作。

赫茨尔最后对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作总结时，承认他通过迫使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服从大会决定的要求是战术上的失误，但是，当主要是来自俄国的一些人投票反对这个计划时，他感到被背叛了。^{[2](p.1549)}当时运动确实面临分裂的危险。当退席的反对派代表返回会场的时候，他们声明不是因为赫茨尔，而是心灵受到创伤的自然的表。在大会闭幕的讲话中，赫茨尔回顾了他的君士坦丁堡之行，他指出在 1901 年他就已经争取到了特许证，可惜却没有足够的钱支付给苏丹。需要的数目是 150 万磅，而来自伦敦的支持只有 8 千磅。“当人们对于这样的请求只能给予如此的答复时，他们的批评就应该有所克制而不能如惯常在我们组织中那样无所顾忌。这就是我的处境，钱你们是不给我。那么就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可是在过去的两天中，我已经见识到你们是如何帮助我的，是如何支持我的外交行动的。”^{[17](pp.461-462)}但是，考虑到运动内部现存的巨大分歧，也为了运动的继续发展壮大，赫茨尔还是让代表们确信英国和俄国人的信都给犹太复国主义带来了空前的机会并表明了他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他以希伯来语致结束语：“如果我忘了你，啊，耶路撒冷，就让我右手致残吧。”他还举起右手着重强调这是一个庄严的誓约。代表们都脱去了鞋子，以雷鸣般的掌声向赫茨尔的建议致意。^{[1](p.163)}

会议结束后，遵照大会的决议，调查团还是到东非进行了调查，他们上交的报告最终证明乌干达并不适合犹太人的移民，赫茨尔认为这样的结果相反成了好事，因此，在 12 月 27 日的《犹太编年史》和《犹太世界》上，赫茨

尔刊发了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执委会的通知，宣布将放弃东非计划。乌干达计划最终的解决是在赫茨尔去世后的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

乌干达计划的失败是具有必然性的。

首先，在《希伯来圣经》中“锡安”一词经常作为耶路撒冷的代称出现，此名称的宗教和感情特性来源于耶路撒冷是王国的首都和圣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作为圣城蕴含了犹太人的信仰要素。因此，犹太人在流散世界各地的两千年以来一直坚定着重返“锡安”的信念，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在犹太人最为集中的东欧具有重要影响的热爱圣山运动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强化了犹太人重返祖先家园的信念。在乌干达计划中，犹太人宗教信仰对于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可见一斑。大多数的俄国代表反对乌干达计划，而他们正是以后移民的主要力量，即使来自基什尼奥夫，曾受过最残忍的大屠杀之苦的代表也坚持重返巴勒斯坦。他们中有人甚至说：“任何人要是促使犹太人去非巴勒斯坦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定居就是一个叛国者；等价于背教。”^{[13](p.45)}因此，乌干达计划是赫茨尔一次世俗性质的建国计划，没有大多数宗教信徒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英国政府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态度的转变也是计划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张伯伦政府时期，通过与赫茨尔的交涉，看到了一些对不列颠政策有积极意义的机会：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可以获取世界犹太人对他的行为的同情，同时，英国国内也有不少同情犹太人重建国家的呼声。但是，来自第六届代表大会上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巨大阻碍，使得英国政府也开始反思这项实行过急的计划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同时，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大臣也于1903年8月28日在《泰晤士报》上公布了一封由德马雷斯勋爵起草的来自乌干达首都内罗毕的抗议电报，指出如果将英国人民出钱建设得如此好的乌干达给了外国人，这对于英国的纳税人是不公平的，并且这样必将导致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吕西安·沃尔夫作为有影响力的政评作家也写信到《泰晤士报》，总结了所有主张社会同化的犹太人反对赫茨尔和东非计划的言论。沃尔夫是这个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他在这时退出了政府以便更好地去宣传他那些紧跟帝国政策的计划。哈瑞·约翰斯顿作为非洲的开发者，并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乌干达的权威领导，在《泰晤士报》上表明他反对乌干达计划但是并不表明他不同情犹太人。^{[7](pp.467-468)}很多英国人赞同约翰斯顿的看法，他们认为将这片土地给予并不适合它的人是不明智的，犹太人仅是以它为跳板来重返家园。1903年9月，张伯伦辞去了殖民大臣的职务，外交部也因为英国的强大舆论压力和驻肯尼亚大臣查尔斯·埃利奥特先生的强烈反对而果断地保留了意见，计划没有被完全终结，却被明显地搁置起来了。

最后，赫茨尔在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去东非的态度和英国国内的反应后，相反希望从调查团那里得到一个否定的报告，这样可以使英国政府打算给犹太人另一个可定居的地区，并逐渐让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巴勒斯坦的目标是不可改变的。这个结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相当有利的。同时赫茨尔面对来自运动内部的巨大压力，只能选择放弃乌干达计划。

同时，乌干达计划也是赫茨尔生前最后一次重大的外交努力，在赫茨尔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乌干达计划是赫茨尔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要转变。赫茨尔在1895年写成《犹太国》的时候，建国的目的地确实还在巴勒斯坦与阿根廷之间摇摆。他一直认为现实当中的犹太国所在地并不重要，他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为犹太人创建一个犹太国，犹太人在自己的家园中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且在自由与荣誉中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经过多次外交努力，一个个选址计划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乌干达计划失败后，赫茨尔此前对于犹太国的设想受到了冲击，他不得不在选址的问题上转变态度，最终明确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作为永久的、始终不渝的回归地，这是赫茨尔直到生命末期出现的巨大转折，他在乌干达计划失败后和诺尔道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这个最终目标（巴勒斯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可是在能预测的未来是难以实现的，……同时，我也认识到这个计划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决定性的分裂，这样的分裂也恰恰发生在了我自己身上。”^{[7](p.465)}只可惜这个转折之于他本人及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义伴随他生命的终结未能得以体现。

第二，乌干达计划体现了赫茨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优秀领导人的巨大威望及不凡气度。在第六届大会出现分歧时，赫茨尔就带着极度失望的沉痛心情为巩固运动的统一做出了让步，并耐心地向犹太代表们做出了解释和承诺：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举措，都是朝着巴勒斯坦这一方向的。同时，大会结束后，赫茨尔针对仍在延续的分裂趋势，于1904年4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由欧洲和美国代表，包括乌西施金等反对者在内的特别会议，他忽略了对他领导职位的攻击，而呼吁保持统一。他表明通过这次事件对犹太人的理解，他已经从最初认为的犹太国建在何处都可行的观点中明白过来，只有在巴勒斯坦他们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他们在原则与政治利益上有多大的分歧，运动的统一是最核心的。可见，在乌干达计划所带来的危机中，赫茨尔以坦然的气度，承受着很多犹太人的误解和猜测，在危急关头包容异己，审时度势，化解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分裂的危机，巩固了运动的统一，这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赫茨尔体现了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的卓越才能和品质。因此，即使在今天的以色列，他仍然被人民视为“精神之父”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乌干达计划虽然失败了，却是赫茨尔具有实质性的外交成功。在近十年的奋斗中，赫茨尔在没有实际的物质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进行了很多外交实践，无论是与苏丹政府、德皇、罗马教廷和俄国的接触，都花费了巨大的财力与精力，可是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性举措，不是含糊其词的拒绝就是精神上的声

(下转第44页)

[7] J. Donald Hughes, "Ecological Process in World History," in J. Donald Hughes, ed., *The Face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New York: M. E. Sharp, Inc., 2000.

[8] 唐纳德·沃斯特. 侯文蕙译. 尘暴: 19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上接第 57 页)

援, 在巨大的失望之中, 乌干达计划无疑成为赫茨尔外交实践中的巨大成功, 一块实实在在的建国之地终于唾手可得。当实用主义的领袖与执着于宗教的民众相遇时, 计划的失败和赫茨尔的转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可是, 赫茨尔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英国政府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其重要性在以色列国建立的过程中显现无遗, 并成为赫茨尔未能亲见的重大外交成就。

总而言之, 乌干达计划对于整个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首先, 乌干达计划终结于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 大会对复国地址的最终确定与赫茨尔的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密不可分, 此后重回巴勒斯坦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都是矢志不渝的目标, 一直伴随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

其次, 乌干达计划使早已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达到了高潮, 尽管通过赫茨尔的努力, 运动保持了统一, 可是激化了的矛盾再也无法消除。人们普遍认为使运动的成员团结起来的首要因素就是对领袖的忠诚, 在赫茨尔去世后, 乌干达问题的争论仍未解决, 各个派别的斗争愈演愈烈,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方针和政策都出现了波动与调整, 进入了沃尔特·拉克所说的空位期。^{[1](p.169)}

最后, 乌干达计划“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上升到具有国际性的重要意义的政治运动之列, 同时也表明了英国政府关注犹太人问题解决办法的兴趣。这个非常成功的形势所带来的是,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质上正踏向国际政治舞台, 正如过去赫茨尔一直致力于的结果。”^{[19](p.238)} 这一系列的成果在建立以色列国的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今天已经显而易见。

注 释:

苏联内务大臣普列为于 1903 年 8 月 12 日所写, 赫茨尔之前曾与他商谈过。普列韦代表沙皇政府承诺将与苏丹交涉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协助他们组织大规模的犹太移民, 并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点以最终实现在那里创建一个犹太国的目标。

David Vital, *Z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02 and Isaiah Friedman, *Herzl and the Uganda Controversy*, in *Theodor Herzl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5, 不同于沃尔特·拉克著《犹太复国主义史》中的人数, 疑误。

参考文献:

[1] 沃尔特·拉克著. 徐方, 阎瑞松译. 犹太复国主义史[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2.

[2] Raphael Patai Edited,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Herzl Press. Thomas Yoseloff. 1960.

[3] Isaiah Friedman. *Herzl and the Uganda Controversy* [A]. *Theodor Herzl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C]. Scotland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Chaim Weizman. *Trial and Error*[M]. Oxford: Greenwood Pub Group, 1972.

[5] J.de Haas.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ical Study. vol.II*[M]. Chicago and New York: The Leonard Company, 1927.

[6] David Vital. *Z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7] Alex Be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 Samuel. *Theodor Herzl——A Biography*[M]. Philadelphia :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56.

[8] Nahum Sokolow. *History of Zionism, 1600- 1918*[M]. New York: KTAV Pub House, 1969.